

李永 著

鲁西南

LUXINAN
CHUANTONG YINYUE SHI

传统音乐史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李永 著

鲁西南

LUXINAN
CHUANTONG YINYUE SHI

传统音乐史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西南传统音乐史 / 李永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72-0775-2

I. ①鲁… II. ①李… III. ①音乐史—山东省 IV. ①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3837 号

鲁西南传统音乐史

李永著

责任编辑 薛华强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7-1号 邮编: 21502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16 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0775-2 定价: 3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音乐是一条永无止息的河，它源自人类的心灵，经由生活的沉淀，幻化为精美的意象。她充盈着民族的生命与灵魂，记忆着社会的变迁与历史，彰显着华夏儿女的智慧与激情。音乐给予我们美妙的遐想，珍藏着千古岁月的铿锵，拨动着我们多感的心弦，反映着我们美好的向往。她，时而含情脉脉，如深沉的回响；她，时而澎湃荡漾，如急流的奔狂；她，时而轻吟低唱，如一弯月亮……飞溅的浪花上跳动着七彩音符，粼粼的波光里闪烁着不朽乐章。

音乐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就随之产生。而音乐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人们宇宙观、世界观的不同，它们在音乐文化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如中国人的音乐思想是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哲学体系，讲求礼乐治国、天人合一，他们以生命为主体，追求简约、单纯、简洁和明快，讲究意境和神韵。当传统音乐面对全球格局之语境时，传统不单是一个客观实体，也不仅是一个时段概念，它是一种精神维度。当传统文化面临“他者”文化的质疑，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信仰和文化是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信仰，否则将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失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国人面临巨大的信仰危机。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信仰缺失？如果缺失，信仰又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但我们骨子里有着对某种主流文化的依托。这种主流文化对我们生活、社会的影响不亚于西方宗教信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这种经过五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这种信仰有别于宗教信仰，不像宗教信仰那样具象化。西方的宗教信仰往往都会具象化为一个神或者多个神，其以个体化、人物化的形态展现出来。如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这些都是精神、信仰具象化产生的。而中国没有这种具象化的“神”。但我们有中国

精神,有着一直引导、影响我们发展的中国之道,这种“道”,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呢?恍然明白,中国人有信仰,并且一直都有,有这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文化信仰。

自古以来,这种文化信仰就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如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无一不是深深刻在国人骨子里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是国人发展生存不可或缺的。叶秀山曾在其短文《今人当自爱》中提到,历史不保证不“埋葬”好东西,“埋葬”与否,各有其因。但主要还在“今人”能否“识得”那些好东西的好处。如果“今人”识不出什么好处,就可能“遗忘”、“埋葬”它们。把“古人”创造的优秀的、好的东西丢掉了、遗忘了,则是“今人”的问题,是“今人”愧对“古人”。作为音乐后继者,应该说我们在历史中亦扮演着传承者的角色,若将“传统”视为动词,我们也是这个动词的执行者和阐释者。正如叶先生提出的:古典艺术需要好的“阐释者”。传承者要学会辨认“好的东西”,如此,才能形成表演者、欣赏者、批评者、阐释者的良性互动。

枣庄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李永教授的这本《鲁西南传统音乐史》,取区域传统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将目光聚焦在鲁西南这片热土上,在搜集凝练大量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的前提下,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吸收音乐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概括和描绘出鲁西南传统音乐发展历史的基本面貌,补足了鲁西南传统音乐史研究的空缺,也为人们了解和探索鲁西南传统音乐文化贡献出可以参照的理论成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语)愿李永教授撰著的《鲁西南传统音乐史》,成为我国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源头活水,给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愿为《鲁西南传统音乐史》的出版而鼓呼!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基地副主任、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音乐史
学会理事、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硕士

杨和平

2014年3月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传统音乐文化探源	(004)
第一节 缘起	(004)
第二节 文化背景	(005)
第三节 历史遗存	(007)
第二章 鲁西南音乐文明的雏形	(010)
第一节 乐舞文明时期	(010)
第二节 礼乐文化时期	(012)
第三章 鲁西南民歌	(016)
第一节 历史沿革	(016)
第二节 鲁西南号子	(018)
第三节 风俗歌——端公腔	(027)
第四节 花鼓	(033)
第五节 儿歌	(038)
第六节 小调	(042)
第四章 鲁西南舞蹈	(049)
第一节 历史沿革	(049)
第二节 舞蹈名称与地域分布	(052)
第三节 舞蹈种类与代表舞种	(054)
第四节 鲁西南舞蹈的总体特征	(079)
第五章 鲁西南民间戏曲	(081)
第一节 历史沿革	(081)

第二节 代表剧种	(082)
第六章 鲁西南民间曲艺	(131)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31)
第二节 代表曲种	(132)
第七章 鲁西南民间器乐	(156)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56)
第二节 代表乐种	(158)
第八章 曲阜祭孔仪式音乐	(172)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72)
第二节 主要特征	(173)
参考文献	(185)
附录	(189)
后记	(197)

导 论

传统音乐文化,同其他诸种文化形态一样,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结晶。它们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内涵丰富,不仅为各民族所共同拥有,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支脉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滋养着民族的文化土壤,孕育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无穷动力,保留了民族历史的记忆,体现着民族的风格。它是民族智慧与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各民族间进行交流的情感桥梁和精神纽带,更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活态”见证。同时,它又是不同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是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习性的“活态”显现,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彰显着不同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在华夏大地上,古称“齐鲁”即今之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孔孟之乡、东夷文化、齐鲁礼乐早已为世人所景仰。鲁西南传统音乐文化作为山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7000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悠久。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孔孟文化之地”、“运河之都”的济宁。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三皇五帝”留下的活动踪迹,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少昊、少康帝均出生于鲁西南济宁之地(另一种说法,黄帝生于河南新郑)。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臆、吴起,农学家氾胜之,经济学家刘晏,文学家温子升等大批圣贤,都出生在这里。商汤时期的三朝元老伊尹,春秋时期的“一门三贤”冉耕、冉雍、冉求,“商界鼻祖”范蠡经商、黄巢起义、宋江聚义等故事都发生在菏泽。春秋战国时期,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历史上五大圣人的“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都诞生在这里。杜甫、李白、曹操等文人墨客都在济宁留有足迹。元明清三朝曾在济宁设立河漕衙门。这里有“江北水乡·运河古城”、“鲁南明珠”之称的枣庄。早在7300年前,人类就在枣庄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北辛文化”,这是迄今为止黄淮地区考古

发现最古老的文化,也是东夷文化的源头。先秦时期,枣庄境内分布着7座古城邦,是我国古都城分布最密集的两个地区之一。境内最早的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拥有京杭大运河上南北文化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特征最鲜明的台儿庄古城。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华资企业——中兴公司在这里诞生,并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只股票,中国第一条民族资本铁路也诞生在这家公司,这里还有“承东启西,引南联北”的菏泽市。著名的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境内各县(区)都有发现。历来被称誉的上古帝王尧、舜、禹都在此留下了足迹。

鲁西南地区滕县、曹县、邹城、嘉祥等地,曾出土大量音乐文物,包括陶埙、编钟、青铜编铙、编磬、骨哨、琴、瑟等,也有众多的汉画石像乐舞百戏图出土,加之流传至今的各种吹、拉、弹、打民族民间乐器,充分证明了鲁西南地区悠久的传统音乐文化蕴藏丰富。《诗经》中的《齐风》《鲁颂》以及《战国策》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均为鲁西南古老传统音乐文化的真实记录。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鲁西南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而由人民群众世代传承下来的相关传统音乐,更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并极具浓郁的地方色彩。据调查统计,今鲁西南境内有民间歌曲近万支,民间器乐曲上千首,民间歌舞与小戏也有近百种,地方戏曲近20余种,曲艺也不下10种,民间乐器种类也相当多,可谓形式多样、色彩斑斓。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鲁西南地区高唱起反侵略的歌声,以唤醒民众。我们耳熟能详的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歌曲《洪秀全起义》《长毛来到曹州府》等,在历史的征战中,鼓舞着人民的革命斗志。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鲁西南地区曾是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与后方根据地,广大的革命音乐工作者积极响应“文艺为战争服务”、“一切均为战争胜利”的口号,创作了大量的歌曲,群众歌咏活动空前展开,为配合、支持人民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传统的民间音乐得到挖掘。民族民间歌曲的收集整理,戏曲、曲艺音乐的传承创新,民族器乐曲的编订,乐器的改革与乐队的建制等方面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传统音乐文化事业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创新、提高,音乐文化事业在各方努力之下,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时过境迁,当今时代,我们的民族瑰宝——传统音乐却面临着继续生存的困境。我们回顾鲁西南地区传统音乐的历史进程,不仅可为鲁西南文化研究添砖加瓦,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将成绩斐然、蕴含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第一章 传统音乐文化探源

第一节 缘起

说到音乐的源起,我国最早、最为典型的说法见于《吕氏春秋·大乐篇》,文中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始于度量,生于太一。”“生于太一”这一具体而又抽象的哲学判断,说明音乐的缘起与人类的起源一般古老。由于远古时代人们的认知水平、社会生产的发展,他们不可能也无法对此论题展开深入的阐释和论证,因此,也就无法解剖音乐缘起的真正“胚胎”。人们更多的是从实证的视角来揭示音乐缘起的奥秘,于是出现了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异性求爱说、语言兴奋说、劳动起源说等。如此说法,表面上看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仔细推敲起来,它们实质上只是通过对原始音乐现象的罗列所得的结论,均未能揭示出音乐缘起的实质。

音乐是什么? 19世纪伊始,史前考古的风靡,众多考古成果的出现给人类史前文明的考察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也直接促成了人们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起源问题的认识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哲学的层面看,音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从审美发生视角来看,音乐是人为了满足自身听觉感性需要而创造的审美对象;从文化学的视角看,音乐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和存在于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些归结起来,共同指向了人类学这一基础和前提。在这方面,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1862—1927)做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探索。他广泛收集当时人类学家对安达曼群岛、澳大利亚、火地岛以及美洲、非洲等原始氏族部落的艺术活动资料后,将艺术的缘起问题同史前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一切文化因

素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和论证,并指出:“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1〕格罗塞此言,虽未直接涉及艺术缘起的各种具体的原始形态,但向我们指明了艺术缘起的文化土壤,为后人对艺术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音乐的起源建立在广泛的人类学基础之上,也必然在文化起源的地方。

第二节 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渊源当追溯到远古时期,对鲁西南传统音乐历史源头的追问也不例外。鲁西南民间音乐,作为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山东古代文明的渊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山东沂源土门乡发现了成年猿人头骨、眉骨化石,经考证是历史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也证明了“山东人”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之一。

从8000年前,山东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公元前2000年,这里先后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三个阶段,又因这一时期的山东人被称为“东夷人”,故而得名“东夷文化”。其中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的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命名的“北辛文化”是山东目前发现最早的有陶新石器文化。



1978年至1979年在山东滕县发掘的北辛遗址

虽然它们不是最早的原始陶器,但其以“沂沭细石器文化”为历史渊源,使山东的史前文化形成了完整的对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大汶口文

〔1〕〔德〕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

化”也是山东较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历史为距今6000—4000年左右,以山东泰安南部大汶口遗址命名。“龙山文化”紧接在“大汶口文化”之后,首先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掘,故而得名。

以上三个文化阶段历经千年积累,为后来山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特别是称誉百代、璀璨夺目的齐鲁文化,就是在高度发达的东夷新石器文化基础上,与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进行广泛交流而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这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所创造,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确切地说,齐鲁文化,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光辉灿烂的齐鲁文化。

第三节 历史遗存

一、北辛文化音乐遗存

所谓北辛文化,指的是以1964年在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发掘的文化遗址命名的文化。据考古测算,距今有7300余年。北辛遗址出土的粟粒朽灰,以及出土的大量农具如石刀、石铲、石镰等证明了北辛人已经过上了稳定的农耕生活。从滕州博物馆珍藏的北辛出土文物中,也发现有不少北辛人使用过的陶(玉)器或陶(玉)器碎片,这是北辛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开创了陶(玉)器制作的历史。这些陶(玉)器制品的外壁上印有形式多样、质朴而生动的纹饰,锥刺刻划纹、堆纹、人字形压划纹、波折纹以及各种鸟类的爪纹都可见到,反映出北辛人审美意识的原始萌芽。



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动物)



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夹砂黄褐陶(器具)

巫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原始农耕生活中的一种仪式,并且是人类最早的仪式行为,本质上是原始宗教的原初形式。由于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无法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各种自然现象,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崇尚自然的观念,巫术活动由此产生。结合北辛人,农耕社会时期,各种变幻莫测的天象主宰着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也自然成为他们心中的至上之神,原始农耕的巫术歌舞活动应运而生。这种意识活动或用于祈福消灾,

或用于祈求降雨。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原始农耕时代，求雨的仪式主要是直接模仿雨或生雨的乌云和雷电，你几乎可以把他称作为一种玩雨的游戏。”〔1〕这种玩雨的游戏不正是原始农耕巫术歌舞的生动描述吗？

还需说明的是，在北辛人的农耕巫术歌舞中，被敲击的配合巫术表演的陶钺、石铲、石刀等具有原始乐器的功能。这是以往沂源后人的原始狩猎和巫术活动中所没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乐器的最初起源与劳动工具不无关系。

这样，原始劳动工具的生产与创造便具有了双重意义。其物质性价值主要体现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实用性；而精神性表现为既能给人带来造型上的视觉效果，还可能诉诸人类的听觉感受。因此，工具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论是造型还是声音，都被赋予了能够表达情感的意义。北辛人所用的石铲、石刀、陶鼎、陶钵在巫术歌舞中，不仅作为巫物来供奉，而且在被敲击发声以向天神传递自己祈求信息的同时得到心理平衡。从客观上说，敲击各种器物更能强化巫术歌舞表演的节奏，具有了情感的因素，“乐器”由此产生。

二、大汶口文化音乐遗存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另外，该文化类型的遗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后得出数据，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 6300—4500 年，延续时间 2000 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约前 4300—3500 年间，为刘林、王因遗址，出土有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彩陶盆、钵等。彩陶有单色的虹彩或黑彩，稍晚盛行白衣多色彩陶，纹样为花瓣纹、圆点钩叶纹、菱形纹等。中期，约前 3500—2800 年间，为大汶口墓地早、中期，有折



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刻文

〔1〕 [奥]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03.

腹罐形鼎、实足鬻、大镂孔圆足豆、深腹背壶等。晚期,约前 2800—2500 年间,为大汶口晚期墓,有篮纹鼎、袋足鬻、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灰黑陶、黄陶剧增,彩陶数量减少,流行螺旋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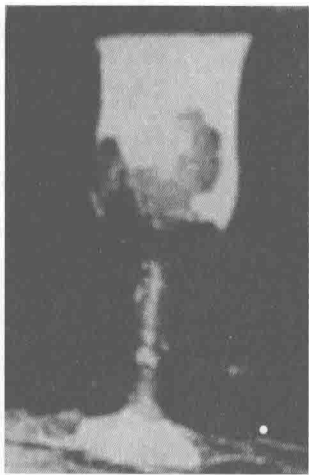
据已有资料显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的刻文,可以认为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1〕

对大汶口音乐文化发展的了解,我们可以从出土的石、陶等工具,人体饰纹、陶文符号以及原始乐器等推断其形式,“是以农耕巫术歌舞为基础,兼及图腾、战争巫术歌舞为主体”〔2〕,成为齐鲁音乐文化的早期雏形。

从历史上看,齐鲁先民们的舞雩礼俗当是北辛人求雨祈年之农耕巫术歌舞的继承和演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鸟类图腾的兴盛、战争巫术歌舞的崛起,不但没有因其巫术礼仪形式的更新而淡化了它的农耕主题,相反,更增加了农耕文化的色彩。

1979 年,山东博物馆在对大汶口晚期墓葬进行抢救性挖掘时,出土了一枚造型奇特的泥质黑陶高柄杯,筒高 16.4cm,柄高 8.4cm,柄径 1.5cm。

经考古认证,这一高杯为一枚具有深远文化内涵的远古吹奏乐器。经山东艺术学院曲广义教授的测音研究,结果证明:当时大汶口人的音乐审美能力至少已经能掌握较为完整的三声音阶。也说明了大汶口时期在音乐上已逐渐成熟。



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高柄杯

〔1〕 张之恒. 中国考古通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7-184.

〔2〕 林济庄. 齐鲁音乐文化源流[M]. 济南:齐鲁书社,1995:37.

第二章 鲁西南音乐文明的雏形

第一节 乐舞文明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明的初始时代。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4350—395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盛时期。

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附近,1965年发现。整个遗址南北约2000米,东西约1500米,由若干个遗址群组成,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龙山文化时代,氏族部落瓦解、人类主体意识增强,原始的图腾崇拜也随着人们理性的觉醒转向英雄崇拜,由颂神转向颂人。

中国文化史上一系列的文化超人——炎帝、黄帝、尧、舜等先后诞生于这个时期。各位帝王时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形式,称乐舞。黄帝时期崇拜天神的乐舞《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以及夏朝的《大夏》和商代乐舞《大濩》构成了影响深远的乐舞文明时期。这些都与鲁西南早期的乐舞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尤以舜的音乐传说更富传奇色彩。